

1、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

赵树凯：社会学研究 1997 年第 1 期

文章从调查所得出的数据和个案材料出发，围绕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进行描述性分析。文章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以自发性为基本特点，以自我组织为主要形式，流动就业者的内部组织形态主要有三种类型即生产经营型、生活友谊型和秘密社会型。政府部门对于流动的管理本身也存在着无序低效的问题。文章指出，调整管理行为的主要方向有：赋予“有序化”以科学的理解，树立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方向，重视发挥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文章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流动发生的机制。农民工初次流动是一种自组织流动，初次离乡的方式是集体上路，结伴同行。自组织外出的核心纽带是亲缘关系。农民工的再次流动则是在权益受损和新的利益驱使下的流动。新的业缘关系和个人独立的信息渠道发挥作用，正式就业中介组织的作用就更加弱化。

第二部分分析流动者的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内部依靠初级的社会关系，没有完整的组织形态，但有相对稳定的组织成员。作者划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并指出了不同的组织特点、人员构成以及内部结构与功能。

文章第三部分主要提出改进建议。作者认为必须建立三个“一”管理办法，即一个机构、一种证件、一种收费，政府必须成立专门的农民工管理机构，坚决杜绝借各种证照名义对农民工乱收费，合理引导农民工的流动。

2、中国“民工潮”与经济发展

王洪春 社会学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本文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民工潮”现状、起因和前景。农民工外出流动的主要原因包括：增加收入、学习技术、向往城市生活，这些是直接微观因素。农业劳动力增长过快、农业资源不足、农村发展缓慢、农业投入不足、农民负担过重、农业比较收益过低是主要原因。“民工潮”可能出现三种前景，这三种可能都集中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战略方面。第一种可能是差距扩大，“民工潮”更汹涌；第二种是差距缩小，民工潮缓和；第三种是继续保持现状。

第二部分分析了“民工潮”的作用。主要集中在：第一，改变了民工和他的家庭收入和经济状况，增加了发展的机会。第二，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培养了人才。第三，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梯度发展战略，也推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加速了产业结

构的调整。第四，推动了政府管理政策，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政策。“民工潮”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发展后的第三次伟大壮举，也是农民第一次主动积极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改革。

3、“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陈映芳 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3期

本文从“市民权”概念入手，分析进城农民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文章认为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其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目前中央政府的放权与地方政府的自利并不利于农民工权益的改进，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社会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农民流动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

作者认为，受到广泛而严厉批判的中国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之所以被维持，首先是因为政府的需求，这项制度对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社会秩序管理承担着特殊职能，它限制着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同时承担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分配功能，国家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通过户籍制度来排挤农业人口。

随着改革的深入，近几年来，执政党及其政府不断地推出新的政策以适应市场改革的需要。执政党和政府敦促各级地方政府、城市政府和机关职能部门“保障农民工权益”，但国家不废除户籍身份制度，也不提供国民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政府将落实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义务责任下移到地方及城市，“国民待遇”被缩小为“市民待遇”，但城市政府有强烈的自利特征，因而户籍制度政策进步缓慢。

文章还认为，农民工尽管普遍存在着不公平感，但他们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面对城市政府，他们基本上是不表达，不申诉，作为一个可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身份类别，“农民工”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是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但解决农民工权益缺失问题，必须把它上升到“市民权”的争取上来，流动农民要获得的是更多的平等的市民权。

4、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

王毅 童星 社会学研究 2004年第2期

本文将流动农民置于从“农村人”向“城里人”转变的“过渡人”这一位置，社会支持网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行动者从网络成员那里提取资源，而不是个体自身拥有的资源来解决

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对于流动农民来说，进入陌生的城市社会也是告别热恋的乡土社会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南京市务工经商的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分析并对比天津的城乡居民社会网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于城市居民，也小于农村居民，规模小，紧密程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

第二，尽管这些农民社会生活场域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血缘、地缘关系这些原有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这是因为对于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流动农民来说，原有社会制度尤其是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是“冷漠”或“漠视”。

第三，与农村居民的关系构成相比，流动农民的地缘（邻居、老乡）作用下降，而与城市居民关系构成相比，业缘力量不突出，亲属力量突出，对亲属这种强关系的信赖并不是一种传统农民习惯，而是这一社会结构安排下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

5、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李强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1 期

“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变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当中那些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是拉力，流出地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是推力。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中国的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相比有巨大差异，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推拉都发生了变形。

第一，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中国农民的流动，可以看出，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是促使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主要动力，与国际模型相比，虽然在农村失业人口、向城市倾斜政策以及影响流动距离的因素上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国际上的农村暴力、农村人口无控制增长、农民失去土地等在中国并不存在。

第二，户籍制度是影响中国推拉的最重要因素，户籍制度是中国城乡流动最突出的制度障碍，其阻力不只是对一般推拉发生影响，它发生作用的方式是使得推拉失去效力。

第三，推拉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者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形。本文提出了农民工“生活预期”、“生活目标”、“心理定位”等概念来解释农民工的此种心理变形。

第四，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农民工外出打工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周期”，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返乡务农或经商，这也预示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分化，即分为准备回乡的农民工和

不准备回乡而更愿定居城市的农民工，因而出现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

第四，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距离家乡远的，在家乡生活水平低的，来城市时间长的这部分人，越来越不愿意回家乡，形成了以定居为生活目标的人群。

6、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文军 社会学研究 2001 年第 6 期

本文的分析依据采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农民微观的个人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宏观的农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为研究目标，以合理化来说明农民外出就业这一目的性行为的动因。本文认为，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因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总体上看，农民外出就业是理性行动的表现。中国农村从总体上是走了一条过密化的道路，其文化层面的原因就是传统农村人口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且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而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是由于生产力过于落后，生存压力过大，而使得传统农民还无法超越生存理性选择而进行经济理性选择或社会理性选择。

第二，从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层面来看，那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而作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只有在生存压力足够大且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才成为一种可能。

第三，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来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到经济理性选择再到社会理性选择。

第四，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要变成一种现实不仅要受生存压力的影响，也要受传统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性安排的制约，而且还要考虑其流动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是否高于其滞留在乡村的过密化生活方式，以及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大小。

第五，如果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在社会结构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自身的生存，其次为自身的发展而理性地行动，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农民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

第六，越是贫穷地区的农民，其外出或转移的越少。这是由于除了其特有的历史文化以外，更主要的是其选择留在原地本身就是生存理性的一种强烈体现，因为理性选择飞越是需要条件的，如选择成本的获得、选择能力的培养和作出选择的具体外部环境。

第七，经济理性选择之所以还一时难以在中国农民身上首先发挥效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可能使中国人理性行动的单位与西方要比更多的是家庭而非个人，在中国，家庭往往是个人理性选择的决策单位。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

